

從古雅典文明到「東方瑞士」之夢

郭正昭 6/10/2012

「印歐民族」(The Indo-Europeans) 的出現和大遷移

「印歐民族」的出現和大遷移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具有關鍵性的一件大事。當北非尼羅河流域的埃及(Egypt)古文明，中亞兩河流域的巴比倫(Babylon)與亞述(Assyria)文明，以及更神秘的菲尼基(Phoenicia)文明，開始停滯衰退之時，一個新興的，具有活力、動力和創造力的族群，叫印歐民族，也叫阿利安人(Aryans)，出現於「裡海」(the Caspian Sea)沿岸，浮現在人類古文明的地平線上。「裡海」是介於歐亞兩洲間的內海，在冰河末期，由於生態急劇變化，印歐民族乃被迫遷徙，一支東向印度，一支西向歐洲，到了大約5000年前，西向的印歐族抵達希臘半島，叫希臘人，其後分佈於歐洲各地，包括羅馬人(即拉丁族，涵義大利、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族裔)，日耳曼人(德國人)，維京人(北歐諸國)，以及盎格魯，撒克遜人(英倫三島)，可說都是印歐民族衍生出來的血緣族群。

從一個大歷史的視野(Macro Historical Prospective)看來，印歐民族構成了歐洲五大族群，三千年後，又因緣際會，由大航海運動與地理大發現，重新流動而整合到北美洲，特別是美國的立國，其主流族群乃印歐民族的再薈萃，再融合，美國建國的「基因池理論」(Gene Pool Theory)和「民族大熔爐」(National Melting Pot)的包容力，可說都是印歐民族經歷數千年，浴火重生，民族文化生命力與創造力傳承與永續的一種奇蹟。這種偉大的歷史軌跡與時代脈動，用弘觀的歷史視野來觀照，形同一首壯麗的文明史詩，是印歐族用血淚譜寫出來的。追溯人類其他古文明，包括北非尼羅河的古埃及文明，中亞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明，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恆河古印度文明，乃至發源於東亞黃河流域與黃土高原的華夏文明，均因封閉而停滯，進而質變為超穩定結構，形同化石，和印歐文明的開放、多元化、永續發展的生命力和創造力，遂不可相提並論。

印歐民族海洋文明的導向與特質

印歐民族大遷移，一支抵達希臘半島，並南下進入愛琴海域(Aegean Sea)諸群島。他們從菲尼基人繼承了很多古文明的餘緒，在愛琴文明基礎上建立了古希臘文明，而以雅典文明最具典範性。說到愛琴文明，我們不能不提到一位偉大的德國考古學家夏禮曼(Heinrich Schliemann)的故事。夏禮曼從小好讀古希臘的荷馬史詩，他相信盲詩人創作的那首「伊里亞德」(Iliad)所歌詠的不是傳奇，而是真實的歷史，乃鏗而不捨，自組考古隊前來，探索挖掘，歷經艱辛，終償宿願，發現「特洛城」(Troy)的遺址，已是一片荒煙蔓草的廢墟。他不但還原了斯巴達聯軍攻下，並最終殲滅特洛十年戰役的歷史過程，重建了「木馬屠城記」的殘酷真相，而且進而從廢墟地層結構中，證實了古愛琴文明的存在，和菲尼基人的行蹤。結合了人類學、語言學和考古學，把歷史研究提昇到一個學術的高峰，做出卓越的貢獻。這是19世紀末葉的事(1880年)。

印歐民族的遷移，有別於其他古文明民族的內陸導向，他們的特質是面向海洋，追逐海洋，充滿好奇心和探險精神。以希臘人為例，他們從希臘半島南移，進入愛琴海，並擴及地中海，因此，雅典文明與愛琴文明是不可分的。當波斯帝國崛起，發動大軍西征，所向披靡，希臘城邦組合聯軍對抗，最後還是依靠雅典城邦在愛琴海域的強大海軍，阻斷波斯大軍的補給線而獲勝。假設雅典聯軍戰敗屈降，波斯帝國的勢力一旦長驅直入歐洲，必然產生毀滅性的大劫難，一部歐洲文明史勢必改寫，不可能是後來的輝煌面貌了！

城邦政治(City State)是現代民主的先驅

說到古希臘文明，我們不能不推崇雅典的城邦政治的典範性。這種典範性，可從下面幾個層面加以描述。首先是「城邦政治」(City State)的形成。希臘人打破了專制帝國，中央集權的形態，他們分別組合成許多小城邦，小國寡民，自成自治體 (Self-government)，人口從數千到數萬，各擁獨立的主權與國格。城邦居民分三種人，自由人 (Freemen)，亦即公民 (Citizen)，奴隸 (Slaves) 和外邦人 (Foreigner)。政治家兼法律人索倫 (Solon)，為城邦政治建構了一套制度，賦予雅典法治體系。自由人專司公共事務，奴隸則負責生產，外邦人形同顧問，沒有階級，但分工明確。三種人均有獨立的尊嚴，和睦相處，型塑共同體精神。他們嚮往自由、民主、公平、正義，已實踐初階的選舉制度，也試行審判的陪審制度 (Jury Duty)。因為自由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，主導政治議題，乃創造出一種民主體制，城邦沒有產生專制獨裁與暴君的生態條件，唯一例外是斯巴達，最具民主典範性是雅典，因此雅典與斯巴達，最後對峙長達卅年，內戰鬥爭之血腥慘烈，史上罕見，史謂「匹羅奔尼斯之戰」(Peloponnesian Wars)。斯巴達厲行軍國主義統治，崇尚專制獨裁，與雅典的自由民主恰成強烈對比，遂產生意識形態的文明衝突。加上雅典領導希臘城邦，挫敗強敵，擊退波斯帝國，威望之盛，形同盟主，更引發斯巴達的嫉恨，一場希臘城邦領導權的龍爭虎鬥，遂無可避免，乃鑄下人類文明史千古遺恨。

伯利克里斯 (Pericles) 是雅典文明的象徵人物

雅典人熱愛民主，珍惜自由，團結奮鬥，勇敢善戰，屢敗斯巴達的強悍攻勢，屹立不搖，像徵古文明一座偉大堡壘。堡壘中坐鎮了一位千古偉人伯利克里斯，他的傑出領導力和智慧光芒，創造了雅典最輝煌的黃金時代。他是一位雄辯的演說家，也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，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，更是一位悲劇英雄。他不但足智多謀，勇敢善戰，而且雄才大略，高瞻遠矚。為了整合希臘城邦，抵抗東方的波斯強敵。他屹立於柏德能神廟，多次發表了劃時代動人精闢的演說，闡釋自由、民主的核心價值，並為守護這些核心價值誓死奮戰到底，廉頑立懦，令人感佩動容。他不愧是一位演說家，千載之下緬懷其言行，猶能領受到銘心刻骨的感召力。他注重文化教育，提倡文學藝術，主張開放而多元化的社會環境，鼓勵人才盡情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，頓使雅典成了人文薈粹之邦，不但古代三大哲人蘇格拉底，柏拉圖，亞里斯多德相繼出世，留下永恆的哲理啟蒙，而歐幾里德，畢德格拉斯，希伯克里特等科學家也先後輝映，開啟了古代科學研究的先河。在文學藝術方面，

希臘人擅長於神話創作，眾神從天帝宙斯以下，均秉賦人性，富幽默感，有同理心，充滿歡樂氣息。另一方面，他們的悲劇意識也極深刻，最有代表性的是「奧底伯斯情結」，俗稱「戀母狂」(Oedipus Complex)，開變態心理先河，和荷馬史詩中的「木馬屠城記」，歌詠特洛城從繁華到絕滅的過程，還有大力士薛佛西斯推動滾石徒勞無功的故事，均異曲同工，賦有悲劇震撼心弦的啟示。但是「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」，英明的伯利克里斯做為一個文明史的偉人，領導雅典對抗斯巴達的英勇奮戰中，竟為天災所制服，一場鼠疫襲擊雅典，使人口折損一半，而他本人也喪命於瘟疫 (Plague) 中，導致民心士氣潰散，國破家亡的終極下場，也自我譜寫曠古悲劇，怎不令讀史者掩卷浩嘆呢？

到了大希臘化時代，亞歷山大崛起於馬其頓，建立橫跨三洲的大帝國，他秉承恩師亞里斯多德的教誨，要建立一個以雅典為典範模型的大同世界。這個偉大的理想，雖因他的英年早逝，不克實現，但大希臘化的影響，間接推移到千餘年後的文藝復興運動 (Renaissance)。“Renaissance”一詞，原始涵意即為「再生」(Rebirth)，乃直指古希臘文明的復活，中世紀的歐洲，重拾了古雅典的人性論，人文主義，以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，加以詮釋弘揚，承先啟後，震古鑠今。追溯近代文明靈契的泉源，豈不在古希臘的雅典城邦嗎？

從古雅典文明到「東方瑞士之夢」的聯想

行腳由雅典到瑞士，我們的關懷也從古雅典文明，推移到台灣人的「東方瑞士之夢」。四十年前，懷抱「美國夢」浪跡斯土，如今也逐漸安身立命了。唯一殘缺的是原鄉精神的憂患意識，難以平息。台灣旅居美國而心繫鄉土的仁人志士，早年倡導「東方瑞士」之說，就是誓志要把美麗島建設成「東方瑞士」。說是一個夢，「有夢最美，希望相隨」，通過艱苦卓絕的實踐，夢和希望均可化為現實。人類一部文明史，不是這樣創造出來的奇蹟嗎？

從奧地利的維也納西行，沿阿爾卑斯山麓的道路前進，極目所見，幾疑身在童話世界，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之美，非筆墨可堪形容，豈不是人間天堂嗎？瑞士公認是當代世界最具典範性的理想國，他們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究竟在那裡？我們且從下列幾點作一些粗疏的解析：

一. 厲行環保教育，要求零污染。從經濟發展的層次做起，他們推動的傳統產業都是節能減碳的，而非高耗能，高污染的，他們把生態的維護，資源的利用，當作首要任務執行，形同使命。他們的產業，包括鐘錶、乳酪、金融、觀光、製藥、文化等，品牌都享譽全球，奠定他們經濟發展的競爭力基礎。

二. 瑞士是永久和平中立國。當代全世界永久和平中立國大概有十幾個國家，但以瑞士實踐得最成功。他們宣示和平中立，但不放棄國防，且實行全民皆兵制，一旦外敵入侵，瑞士人嚴格遵循保國衛民的義務和紀律。如此始能維持近兩百年的和平傳統，連希特勒那種侵略成性的狂人，也知所節制。

三. 選舉之外，他們建立公投制度，每季(春、夏、秋、冬)均舉行公投，公投連署五萬人即可成案，投票過半即通過。公投針對政府決策的疏誤，發揮補偏救弊的功能，使輿論監督制衡的力量，發揮到極致，也杜絕官僚政客濫權腐敗，為禍社會的可能，體現了民主政治的真諦。

四. 政府體制平民化。執政採委員制，而且總統由七位部長輪流擔任，完全採合議制，防止獨裁專斷的可能。鈔票上印的頭像均為雕刻家，音樂家，建築師，以及傑出文化人士，政客官僚的社會地位完全平民化了。如此崇尚民主文化，講求平等，消彌階級化的特權觀，使瑞士人充滿尊嚴，以先進的文化為榮。

五. 族群的融合與國家認同。瑞士人傳承印歐民族的血統，卻是多元族裔組合的國家。德裔 70%，法裔 16%，義裔 12%，原住民 2%。這和台灣福佬、客家、新住民、原住民的比例相當。但是他們沒有血統論的困擾，而以命運共同體凝聚共識，在公平正義基礎上展現深刻的愛國精神。

六. 虔敬的基督教信仰與新教倫理的實踐。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，出了兩位偉大宗家，德國的馬丁路德(Martin Luther 1483-1546)與法國的喀爾文(John Calvin 1509-1564)，他們逃避宗教迫害，分別流亡於德國與瑞士。他們詮釋的「新教倫理」(Protestants' Ethics)，深入人心，產生極廣大的教化功能。喀爾文教派，以長老教會為例，即特別強調民主精神，嚴格採行議會制領導的模式，杜絕了專權與腐敗的流弊。在核心信仰方面，謹守公平正義的原則，認為對上帝虔誠的信仰，必須通過公平正義的實踐來體現。在新教倫理教化與感召之下，瑞士人普遍崇尚自由、民主、公平、正義的理念，並且服膺愛、和平、反戰、非暴力的價值觀，深信不疑，蔚為堅定的共識。這種和平主義的倫理精神，從「紅十字會」的在血腥殘酷戰亂中英勇的人道救助的慈善義舉，把瑞士和平反戰的立國精神，向國際社會弘揚出來了，如何不廣受文明輿論的尊崇呢？

「東方瑞士」之夢的實踐和困境

反觀台灣的現實。當代一位最值得尊敬的知識良心—陳師孟教授，今年三月六日，在一篇「609 萬人何去何從？」的演說中，又提出了「走向永久中立國」的主張，認為台灣永久和平中立的理念，「符合民進黨黨綱的精神」，而且「雖然在內涵上包容了獨立建國的概念，但在感受上比較溫和，比較沒有衝突性。在意象上是讓人聯想到愛好和平的，追求人民幸福的，邁向世界大同的，因此台灣人民可能較有接受度。」何況，「對美國和馬政權來說，永久中立國是他們比較沒有理由反對的。」最後，他語重心長地期待民進黨，四年之後，推出的總統候選人，能以「永久中立，制憲公投」為競選主軸，來落實「永久中立國」的理想。

陳師孟的卓見和苦心孤詣，完全契合了海外原鄉人多少年來懷抱的台灣「東方瑞士之夢」。彷彿希臘神話有一則大力士薛西佛斯推巨石上山頂，徒勞無功的困境一樣，橫亙在台灣人民面前的幾大障礙和結構性負面因素，是必須克服和超越的。

一. 瑞士人是印歐民族後裔，印歐民族是典型海洋文明民族，從歐洲到北美，印歐民族的海洋文明體系奠立並創造了現代化的普世價值，而且主導未來人類文明的發展動向。相對於瑞士兩百餘年的立國傳統，台灣的移民背景，介於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之間，充滿邊緣性格的矛盾，這是台灣社會內在衝突的深層次的結構因素。社會基礎結構的改造，是艱鉅、持久而漫長的人文工程，要有日本明治維新和美國獨立革命的大變革的偉大膽略和氣象，特別是高明的政治領導，才能畢其功於一役。台灣能孕生如此雄才大略，高瞻遠矚的領袖群嗎？

二. 瑞士人自十六世紀以來，得天獨厚，既承受宗教改革的洗禮，且廣涵地，直接地傳承了「文藝復興」與「啟蒙運動」的教化，薈粹了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兩大傳統於一爐，這種際遇是台灣人所匱乏的。台灣「雜教」橫行，野和尚與神棍滿街走，民間信仰乃沉淪為迷信小傳統，政客官僚，富商巨賈，六神無主，見廟就拜，凡事不問蒼生問鬼神，沒有理念，缺乏核心思想，言不及義。根據社會學家調查，台灣土產的神祉，竟多達數百種，完全泯滅了勸善的初衷。不但禍害人心，更嚴重浪費社會資源。台灣雜教迷信的小傳統，和瑞士基督新教倫理的大傳統，對照起來，又如何相提並論呢？台灣不必一場驚天動地的宗教改革嗎？

三. 台灣面臨的另一個更嚴重的困境是，政治的內憂外患，主權與國格的淪喪危機。內有國民黨，外有共產黨，均強烈主張「一個中國」，向極權的中國認祖歸宗。他們信奉「一黨專政」的封建教條，相互勾結，搞「聯共制台」謀略，其實是「投共賣台」的勾當。一個謊言治國的黨國權貴集團，主權意識錯亂失緒，國家認同殘破不堪。版圖是蕃薯還是秋海棠都無從辨認的曖昧，使他們惡向膽邊生，密謀導演一場「木馬屠城記」的曠古大悲劇。對岸的共產中國，本質是「秦始皇加馬克思」，是大一統極權意識與世界革命思想的混合體。其統治模式，對內高壓，徹底剝奪人民的基本人權；對外則武力擴張，侵略成性，對台灣尤懷併吞的領土野心，構成威脅。固步自封的「天朝思想」，抱殘守缺的「集權觀念」，乃是狹隘民族主義與霸凌帝國主義的根源。文革動亂，六四鎮壓，法輪功迫害，均已犯下集體絕滅人類的滔天罪行，難道還必須上演更慘烈的「木馬屠城記」嗎？中國崛起，形同恐龍復活，僅靠一條黑水溝的天然屏障，遠不足以保護家園，捍衛國土。如何弘揚瑞士中立精神，以博愛、和平、反戰、非暴力的「紅十字會」人道倫理精神與哲思，廣結善緣，博取國際社會廣泛同情與支持，所謂「得道多助」，乃當代台灣智者與領導階層的共同使命。

響應陳師孟台灣「永久和平中立」的號召，實現「東方瑞士」之夢

這一代台灣人，如果永遠昏睡在歷史長夢中，不知覺醒，要放棄「自由人」的權力與尊嚴，自我沉淪為浪跡天涯，浮游群落的吉普賽人生存模式，以「亡國奴」自居，拒絕理想國的追求，最後家破國亡，禍延子孫，將悔恨莫及了，又是何等愚昧的判斷和荒謬的抉擇呢？

從海外看台灣，彷彿汪洋中一條船，航行於全球化潮流的驚濤駭浪之中。迷航之際，有高明的智者，站出來指點迷津，導引一個海洋文明的方向，高舉「紅十字會」的精神旗幟，形同一座海角的燈塔，以「永久和平中立」的理想國相號召，使我們重溫了「東方瑞士」之夢。「紅十字會」所象徵的，是海洋文明的人道精神，也正是當代台灣人必須傾注全力去服膺，去建構的。

於此，我們懇切響應陳師孟教授，最近所闡釋「東方瑞士」的理念和主張，認為是台灣建國一條極可行的康莊大道，而且傾佩其謀國的精誠，希望早日凝聚共識，付諸實踐。這篇粗疏的論述，乃是一個海外旅人行腳的隨感錄，野人獻曝，一抒愚昧，就教高明。(筆者另有「談奧林匹克與紅十字會—海洋文明古今兩大標誌」拙作一篇，請一併參考。)